焦点透视

中国式『硬科幻』走向成熟，《流浪地球2》还能更好

·编者按·

2023年春节，《流浪地球2》在国内外同步上映。和四年前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前作相比，续作将中国科幻类型片创作提升至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而瑕不掩瑜的剧作逻辑也相对成功地构建了更清晰、更宏大的世界观，进而续写不同于好莱坞的“中国故事”。但与前作被动待拯救的小女孩韩朵朵相比，续作试图塑造极具专业素养的母亲韩朵朵这一STEM女性形象，还有出场不多的中国代表郝晓晞，本质上都未能承担起推动剧情的角色功能。

中饰演韩朵朵。王智，在《流浪地球2》

佟丽娅，在《流浪地球2》中饰演丫丫母亲。

地球2》中饰演郝晓晞。朱颜曼滋，在《流浪

饰演神秘刺客假韩朵朵。克拉拉，在《流浪地球2》中

■ 陈亦水

2023年，作为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的首个大档期，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一个不平凡的观影热潮。其中，《流浪地球2》已经超过26亿元的收入，和四年前“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前作相比，续作将中国科幻类型片创作提升至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而瑕不掩瑜的剧作逻辑也相对成功地构建了更清晰、更宏大的世界观，进而续写不同于好莱坞的“中国故事”。

中国式“硬科幻”类型走向成熟

如果说2019年的《流浪地球》提供了中国原创“硬科幻”类型片的可能性，那么今年的续作则将“可能”的假设变成了肯定的现实。

严格来说，《流浪地球2》是我国第二部“硬科幻”作品，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科幻电影走的是“软科幻”路线。自从1938年被认为是我国首部科幻电影的《六十年后上海滩》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的儿童科教片、20世纪80年代“科学的春天”语境下的中国科幻文艺复兴，“幻想”内容远远大于“科学”。如今，我国神舟号载人飞船、天宫号空间站等不断发射和建造成功，科技的突飞猛进为科幻电影的视觉化呈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因而《流浪地球2》可谓中国式“硬科幻”类型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值得载入影史。

诚如导演郭帆所言，影片涵盖了如今视效制作的所有门类，因而展示了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最高、数字形态最全面的极致效果。相比于拥有2000多个特效镜头的前作，续作数量增至6000多个，还有超过5000张概念设计图，为了追求细节真实，团队还首次成立了UI部门负责道具的平面设计。同时，关于太空天梯的形状与材质、月球上的太阳风暴等科幻场景，都有天文、物理、化工等领域科学家的深度参与，这都体现了中国“硬科幻”高度的工业化水准。

以共通的情感价值续写“中国故事”

《流浪地球2》虽以技术美学见长，但真正的关键在于“硬科幻”的内核，在于讲述完全不同于好莱坞的“中国故事”。

在世界影史上，1902年第一部科幻片《月球旅行记》就奠定了太空冒险叙事成为科幻片的主流模式。此后，西方流行科幻电影内核都讲述的是作为科技英雄的白人男性如何负载航海大发现时代帝国主义殖民意识进行星际开拓，因而有着“蓝色文明”的底蕴。同样关乎地球危机叙事，《流浪地球》则展现了独属“黄色文明”的土地情结与坚守。在此基础上，《流浪地球2》的故事更富有层次：面对“太阳100年后吞噬地球、300年后太阳系不复存在”的地球危机，人类设计了“方舟计划→逐月计划→移山计划（流浪地球计划）”这三个步骤层层推进，从而构建起故事大框架，中国文化价值表达也更加清晰。

影片拥有三条交错并行的线索：一是以刘培强为中心，直接推进剧情的主线索；二是与之互为表里的图恒宇，但由于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导致出现些许的逻辑漏洞；三是外交层面的中国代表周喆直，以此展现中国视角下的国际关系想象。其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刘培强英雄成长的情感逻辑，一方面是对妻儿家庭的亲情珍守，另一方面则是深受父辈航天员的启蒙感召，前者爆发于人工智能莫斯（MOSS）泯灭人性的逼问、最终使其崩溃的段落，后者表现在目睹师父张鹏、俄罗斯宇航员老诺夫等父辈的悲壮牺牲，在如此清晰的内外情感冲击下，不仅使刘培强从疑惑“危机真的存在吗”的愣头青成长为“我选择希望”的人类英雄，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构建起某种人类共通的深刻情感价值。

关于技术与生命想象的遗憾

除了以情感价值续写“中国故事”，《流浪地球2》还增添了许多关于人工智能（AI）、生命政治与伦理方面的哲学探讨，但由于数字生命计划的线索过于讳莫如深而影响了整体的剧作逻辑。

首先，影片设计了对AI“技术的追问”式反乌托邦视角，但却很遗憾未能展开。无论是印度科学家媒介视角，还是自称莫斯（MOSS）的AI角色，都在视听语言上凸显人与机器的矛盾，这恰恰是我们身处自动化社会的今日现实。但在影片里，拥有如此强烈暗示的技术反思面相却被隐藏了起来，只是侧面展现人类被AI所取代而表达不满；还有图恒宇的父女情深，为了能让图丫丫的生命在虚拟空间里永生而使人工智能拥有了人性，但后者又是在前作中不断给人类制造危机的“大Boss”，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并未充分展开；更神秘的是周喆直所隐藏的叙事线索过多，仅依靠“没有人类的文明不叫文明”的台词和周喆直富有渲染力的讲话只是口号式观点的强制输出，难以说明为何大规模使用AI后又封存，尽管给后作埋下了足够的伏笔和想象空间，但严重影响了故事的完整性与逻辑性。

其次，未能深入的反乌托邦视角，导致了影片生命观的模糊性，即灾难面前，人类该选择怎样的存在方式？国内科幻界存在未来在星辰大海的“飞船派”和基于虚拟世界的“元宇宙派”的二元争论，这在影片中表现为拯救地球派和数字生命派的价值观冲突。可遗憾的是，后者作为引发戏剧冲突、不断制造危机的重要一方始终缺席，使得刘培强的对抗对象面目及其生命观极为模糊，这种简单而模糊化的处理严重影响了影片的价值表达，不仅印度科学家之死与整个故事显得割裂，MOSS与人类的相处方式也只是对《2001漫游太空》里的“HAL9000”的静态模仿，原本极具创意的科技元素沦为对经典科幻作品的符号搬运。

最后，AI技术的碎片化叙事和生命想象的语焉不详。这造成了无人机战斗场景等视效场景比重过大、拼贴感过强，再加上过度依赖交代背景的旁白和倒计时字幕作为剧情推进元素，使之缺乏叙事的流畅性，实在令人遗憾。

STEM女性形象塑造的创作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作被动待拯救的小女孩韩朵朵相比，续作试图塑造极具专业素养的母亲韩朵朵这一STEM女性形象，以及出场不多的中国代表郝晓晞，但本质上都未能承担起推动剧情的角色功能。

虽然韩朵朵对暴徒过肩摔的个性化出场已是不小的进步，刘培强的“一见钟情”及其婚恋想象亦无可厚非，但角色功能在此后仅作为支撑刘培强成长为英雄的内在情感逻辑之陪衬，例如太空电梯里的英勇搏斗不过因为“你把我的花弄坏了”的爱情逻辑，罹患绝症后作为男性英雄的家庭情感要素而完全失去了剧情主导力。

在世界影坛里，科幻类型片中的STEM女性形象之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银幕之外，女性科学家的光芒更是长久被父权文化逻辑所遮蔽。这种STEM领域的性别歧视称为“玛蒂尔达效应”，即女科学家不仅长期缺席，其科学贡献还常归功于男性，这是以STEM科学逻辑为必要基础的“硬科幻”类型片里女科学家缺席的严峻现实。

今年，联合国确定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主题为“DigitALL：促进性别平等的创新与技术”，这与3月6日—17日即将召开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7届会议（CSW-67）的优先主题“创新和技术变革以及数字时代的教育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相一致。在女性参与和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取得了进步，例如我国女性科技人力资源占总量比例已从2005年的约三分之一提高到2019年的40.1%，性别比例更加趋于均衡。在此意义上，一方面我们希冀我国“硬科幻”电影中能塑造与男性主配角或正反派功能相对等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银幕之外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时代里，数字鸿沟加剧的经济阶层与教育的性别不平等、数字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性别歧视，更值得我们关注。

无论如何，确立中国式“硬科幻”模式的《流浪地球2》，在工业化制作水准与剧情结构上比前作更精湛、更丰富，也为未来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在经历了电影产业的“寒冬期”和疫情的萧条后，正如在人类重大灾难面前，主人公仍“选择希望”，期待整个中国电影业能重振信心，各类型、各国家、各种题材与审美风格的影片，能在春节档期过后的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久违的“暖春”。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学人关注

阅读提示

近日举办的“新中国女性群像：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工作坊上，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就女性口述史的实践、知识生产和传播等研究方法及理论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很多发言者都表达了女性口述历史实践者的使命感与强大内驱力：与历史赛跑，书写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让更多已经或即将消隐历史中的女性留下足音；将普通的女性行动者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开拓女性个体与时代相互交织的可叙事空间。

寻访女性历史的足音 展示新中国女性群像

■ 刘宇辰 金一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口述史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口述史和口述史研究更是成果迭出。为了展示近年来女性研究者所记录的多种社会身份的女性个体生命历程，展示女性叙事实践的丰富性，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联合中华女子学院，在《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的支持下，于近日举办了“新中国女性群像：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工作坊，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就女性口述史的实践、知识生产和传播等研究方法及理论进行了分享与讨论。300余位关注女性口述史研究的学者线上参会。

集体主义时代女劳模的再解读

工作坊上，有三篇报告分别以申纪兰、郝建秀和相凤祁三位女劳模口述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申纪兰和郝建秀都是闻名遐迩的女劳模，她们两人体现了城乡间的差别，但就女性如何从私人家庭的一员被塑造为一种公共角色则有探讨的共同意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周海燕教授以表征和展演理论呈现了劳模形象是如何在国家、媒体、大众相互作用下被塑造和传播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分享的相凤祁口述史，展现了她从童工、女劳模到企业老总的跌宕起伏人生。在旧社会，她13岁就进纱厂做童工，新中国成立后用优异的劳动成绩和出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为国争光的资历当上劳动模范，随后进入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工农干部的代表，最终成为中国第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条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够实现的女性由受苦的女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的发展道路，这是真实人生实践。作为女性，通过当劳模、进大学，成为共和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的人生发展之路与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人才选拔制度紧密相关；她的个人能动性嵌入在共产党给予工人高度的认可和尊重的感知上，并将实现中国“化纤”工业的发展与个人的梦想相连接。佟新认为，劳模有上学的机会，这既是新政权对工农出身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工人通过高品质的劳动才能够获得当上劳模并进入大学的机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体脑劳动间的区隔；妇女解放的理念融入这一革命的历程，一名旧时代的女童工能动地利用了这一机会，呈现出中国女性发展的无限可能。

“可托付的教与养”与“劳动的母亲”的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马瑶和导师郑新蓉教授的研究《可托付的教与养——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公共教养空间和“劳动母亲”》，通过60年代一个三线工厂的西迁和子弟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叙事，把我们带回一个用“公共养育”来促成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的时代。集体主义的方式——通过托幼机构和子弟学校，提供了一种可信任的、可托付的“教”与“养”，不仅使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交织在一起，也成就了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母亲”，成功实现从社会新生代的成长由个体家庭向广阔的公共教育空间转换，促进全体工厂子弟的全面发展。评议人佟新教授指出：工厂的子弟学校作为中国集体主义时期的特别产物，还包含了拉平干部子弟与工人子弟差距的意义——工人阶级的子弟获得的教育、未来的出路都同样受到保障，而无须竞争和内卷。在推行“三孩”政策的今天，“可托付的教与养”的议题可放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和借鉴。

寻找女性工作的意义：弄潮商海的女商人

在工作坊中，有两份报告都是以义乌女商人的口述史为例，有经历“鸡毛换糖”初创经历的女企业家，也有“走向世界”的“创二代”，她们都是在现代成长起来的个体女性。既从商业“文化基因”，也从流动与都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的角度，探讨“义乌商业女性所具有的文化性特质是什么”刘柳和她的合作者通过对7名义乌女性的创业经历、创业契机、创业过程以及危机的处理，来探讨女性创业者的内在动力源泉、创业的初衷以及对“有意义的工作”的理解。在很多人眼里创业就是为了挣钱，挣了大钱就是荣耀。那么在女性的世界里是否还存在更重要的意义？评议人这一提问给我们留下诸多讨论空间。

女性口述史的意义和使命

女性口述史的发展意义何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陆远博士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诞生以后，始终就有内部公共性的诉求。新的社会史学的公共性诉求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增加。他以一个贴不上任何“标签”的普通农村妇女“吴根妹”的口述史出版为例，说明口述历史把历史叙述的焦点转向普通民众、指向边缘人、关注弱势人群，让那些本来根本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人发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历史学知识生产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呈现了“人民化”的趋势。口述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对公共史学的推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口述史在某种意义上对抗着三种东西：“迅速生成、迅速遗忘”的现代性特征；将“记忆”和“遗忘”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工具化目的、自然生命的遗忘“本质”——记忆实际上是有一个边界和跨度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口述历史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发展的内驱力。

陆远在分析口述历史的生产实践和传播的过程时指出：口述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在学界内部，还在于把它的学术生命力培植在巨大的读者市场之中，才有其真正的生命力、才不至于这么快被淹没。口述历史的产品被传播、被阅听、被言说、被质疑、被争论的过程恰恰是其价值所在，恰恰是有争议的东西，能够被诘问被检视才有可能或者说才有资格进入公共语言。

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在与谈环节中，特别强调了口述史把视角放在女性身上是“双重的正确”。不仅基于女性在社会中原有的“弱势”，还在于还原她们的人生感悟、经历和以性别的视角反观整个国家的变化、社会的变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很多发言者都强烈地表达了女性口述历史实践者的使命感与强大内驱力：与历史赛跑，书写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让更多已经或即将消隐历史中的女性留下足音；将普通的女性行动者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开拓女性个体与时代相互交织的可叙事空间。特别是我们对新中国女性群像的塑造，将成为从性别发展视角拓展历史社会变革宏大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研究视窗

《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与价值》

作者：何怀宏

自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有了相当的事实基础，人类也已经享受到了“地球村”所带来的种种技术和经济上的实际好处，在观念上形成了“全人类”的明确概念。但是，当谈到“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就要涉及价值的层面。而在价值的层面，我们还需要继续区分事实上的价值观和需要构建、调整的价值的不同层面。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就需要首先面对人类当前的种种危险和挑战，也要考虑从已经存在的价值观中吸取思想资源，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也是基本的行为规范上寻求人类的共识。在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思想也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思想资源，尤其是在如何恰如其分地看待和处理人们的物质欲望的问题上。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数字经济下平台就业能改善个体生育意愿吗？》

作者：丁守海 夏璋煦 欧阳语心

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平衡是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本文作者利用2021年7—10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者的专项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下衍生的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体生育意愿，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女性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平台就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平衡工作和家庭机制来提升个体生育意愿。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显示，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区以及高中和大专这些典型学历个体。这些研究发现为通过促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来改善个体生育意愿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构建更加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人口研究》2023年第1期

《性别微暴力研究：理论透视与干预策略》

作者：王海媚 李英桃

性别暴力包括系统性、直接性的“性别宏暴力”和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妙的“性别微暴力”，传统研究主要关注性别宏暴力，却忽视了长期隐藏在其后的性别微暴力。本文作者认为性别微暴力对妇女等弱势群体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可能导致妇女发展受阻、自信心降低和健康受损等后果。应对性别微暴力，首先，需要准确捕捉和识别性别微暴力；其次，需要建立关于消除该暴力行为的社会共识；再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抵御和消除性别微暴力；最后，实现性别平等是消除性别微暴力的根本途径，而消除包括性别微暴力在内的性别暴力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前提。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白晨 整理）